

批评与重建:对安全政治的新思考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

[内容提要]安全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支。长期以来,侧重物质视角的现实主义范式一直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变化,要求人们对传统的安全政治理论进行反省和检讨。什么是安全?安全的所指对象是谁?如何确保安全?安全研究的性质是什么?本文选择社会文化的研究取向,谋求对上述基本问题加以探讨。

[关键词]安全政治 安全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 社会文化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开始进入安全研究领域,逐渐形成“批评的安全研究”分支。它认为,传统的安全政治理论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对当今世界政治变化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并谋求用新的安全思想取代旧的安全框架,从而有可能形成一种能够适应处于不断变化环境的新的安全哲学。新安全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安全政策不仅是一种军事政策,而且还应该具有政治含义。因此,对传统安全政治的重新考虑,不仅在学术上有其必要性,而且在实践上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概念界定

对一个概念进行定义,其目的是要把这个概念的最本质的含义表述出来。对安全概念进行界定的过程,实际上是谋求说明安全的最本质、最基本含义的过程。通过对安全概念的定义,人们可以明确安全研究的主体、范围、关注的对象、探讨的内容等,并且把这一研究与其它研究区别开来。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概念一直由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所叙述。在传统的安全政治研究里,安全本身的含义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安全即是国家防止外部军事武力威胁以及防止这种威胁所应该具备的本国军事实力。安全研究乃是“研究军事力量的威胁、运用和管制”,即研究“武力使用的可能条件、使用武力对个人、国家和社会所构成的影响、以及国家在准备战争、防止战

争和从事战争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政策”。

然而,安全是一种派生的概念,其本身并没有客观含义。安全的含义是通过主体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如同世界政治中的其它基本概念一样,安全概念不是静态的、绝对的,而是动态的、相对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在当今,安全的含义显然正在随世界政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尽管军事力量在安全政治中具有重要性,但是,把安全概念仅局限于军事方面的认识是狭隘的,因为这种对安全政治的纯军事含义理解并没有能够充分地体现和揭示安全政治的范围和内容。要想真正理解安全及战略问题,人们还必须考虑其它的变量,把军事力量放置在更为广泛的世界政治和对外政策关系中。“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者们认为,安全主要涉及到五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它们是军事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和环境方面。根据这种

关于批评的安全研究文献,可参阅 Michael C.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Richard Wyn Jones, *Security, Strategy, and Critical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 Publishers, 1999.

本文所使用的“安全政治”术语,是指与安全有关的各个方面的总称。安全本身则是一个相对狭隘的概念,属于安全政治的一部分。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1991, p. 212.

参阅 James Der Derian, “The Value of Security: Hobbes, Marx, Nietzsche, and Baudrillard”,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4 - 45;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p. ix. 亦参阅 Paul A. Chilton, “The Meaning of Security”, in Francis A. Beer and Robert Hariman (eds.), *Post - Realism: The Rhetorical Tu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认识,军事只是被理解为全部安全过程中的一部分。

从经验的层面上看,安全所涉及的范围在冷战后的世界政治中的确在扩大。譬如,毒品被普遍认为是国家的社会结构构成威胁的新来源之一。在美国的安全政治话语中,毒品被比喻为“外来入侵者”、“国家主权的践踏者”等,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对毒品“宣战”。在反毒品战争中,美国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和警察巡逻,并且与邻国在军事上进行合作,共同打击毒品走私者、贩卖者以及吸食者。事实上,这种较量过程经常表现为严重的暴力流血冲突。再譬如,一些国家开始把艾滋病正式确立为国家安全威胁的新来源。

对安全的传统理解还忽视了女性的声音。女性主义者通过揭示性别不平等关系和把妇女经历引入安全研究领域,要求对传统的安全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如果从对个人生存构成最直接威胁的角度出发,安全不仅被理解为免遭战争的威胁,而且还应该被理解为安全的工作环境、免受失业的威胁或由于外债而经受的经济压力。女性主义者在对安全问题进行思考时,首先关注的是人们所追求的生存环境和需要,也就是说,安全不仅意味着没有暴力威胁或行为,也意味着分享社会经济方面成就所带来的福祉。美国学者蒂克纳认为,在传统的理论里,理性、安全、权力等观念和概念的含义过于狭窄,而且具有排他性;如果说传统的安全概念一直与军事力量有关、与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外部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概念在当今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讲,依赖战争去确保自身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求,而不是面临军事威胁。

因此,安全概念的含义应该扩大,人们应该突破现存的安全研究状态,以开放的胸怀对安全的含义进行重新理解,根据当今世界政治的变化发展出一种新的安全哲学。安全概念不仅应该反映出它所具有的时代特征,而且还应该反映出它所具有的人文含义,即体现出对普通民众的福利、自由以及免受恐

惧的关注。安全意味着没有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的含义需要得到拓展:从国家层面的安全延伸到个人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安全;从军事层面的安全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及人类等层面的安全;从国家政体的安全扩大到地方政府、国际制度、非政府组织等的安全。

安全的所指对象

提出安全的所指对象这一话题,实际上是要重新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安全研究和实践中,是继续把国家作为唯一的安全对象,还是应该把安全的所指对象扩大到国家以外的其它方面。

传统的安全研究认为,国家是国际舞台的主要行为体,国际关系被理解为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安全事务方面更是如此。因此,国家不仅被置于国际政治分析的核心地位,而且还是安全研究及实践的主要所指对象,即需要得到安全保障的对象是国家,外来军事威胁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传统的安全研究承认“人”的安全非常重要,但认为,在充满残酷的武力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只有国家的安全才能给个人的安全提供保证。只有国家处于安全的状态,它的公民才会安全。个人的安全是在国家范围内受到保障的。根据这种观点,只有关注国家的安全,安全才具有意义。

然而,传统的安全研究没有能够充分地解释和说明冷战的结束以及冷战后所发生的许多国际事件。由此,人们提出的一个质疑是,传统的安全政治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提出重新确定安全研究的所指对象,旨在使安全研究更能贴近并揭示冷战后更为复杂的安全政治现实。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把安全理解为仅仅是国家的安全,那么,它就忽视了处于国家威胁之下的人所处

参阅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 1991; Ole Waever, *Concepts of Security*, Copenhage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1997;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参阅 J. Ann Tickner, "Re-visioning Securit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 Ann Tickner,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同上。

的不安全状态。一方面,个人的安全依赖于国家的安全,另一方面,个人的安全又可能受到国家的威胁,这种“国家威胁”不仅来自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国家之间关系所引起的外国威胁,而且可能来自自身国家的威胁。人们通常忽视的一种情形是,国家可以成为它的公民安全的威胁者,而不是保护者。譬如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本国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在北美洲,一些国家对土著印第安人的迫害。在当今,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更新武器装备,增强实力,它对国内公民的自由和民主所构成的威胁有时可能比外来威胁还大。丹麦学者布赞认为,国家是安全的重要对象,但同时认为:公民个人所面临的许多威胁间接或直接地来源于国家。

英国学者肯·布赞赞成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人民而不是国家乃是安全的所指对象。在他看来,“安全始于国内”。在全球政治中,许多人生存所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外国的”军队,而是来自国内政治、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它们不断制造着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罪孽:营养不良、疾病、奴役、卖淫和剥削。布赞和彼得·维尔在对南部非洲地区的安全进行研究时指出,人们在讨论这个地区的安全问题时,应该首先回答谁的安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那里的地区安全与其说是传统政治理论中所说的国家安全,还不如说是长期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普通民众的安全。

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思考安全的所指对象的话,人们会发现,传统的安全政治理论所叙述的权力、知识以及暴力问题与当今世界政治的现实是不相符合的,因为它只关心确保男性世界的权力关系,而在许多方面把一般民众尤其是妇女放置在不安全的环境里,使她们不仅在直接的暴力威胁面前容易成为受害者,而且也往往容易成为间接的或结构性暴力的受害者。所谓结构性暴力,是指缺乏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和经济安全,导致个人的健康和福利受到威胁,譬如由此而导致的人的生命短寿。尽管结构性暴力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地影响着每个贫困者,但是,贫困的女性和儿童往往受害最严重。在一些贫困国家,当资源和财富发生匮乏危机时,妇女和儿童往往最先遭受影响。

于是,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在考虑安全问题时,

不能只关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和联盟不应成为分析国家行为和战略计划的唯一出发点,而应该对普遍的政治难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分析。具体地讲,安全政治研究不应该只是关注物质权力结构和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国家,而应该从广阔的人文角度去探索权力和暴力之间所具有的政治含义。

因此,安全研究的所指对象应该从国家扩大到人,对人——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安全给予更多的考虑和关怀,使其更能真实地反映和揭示冷战后更为复杂的安全政治现实。安全不应仅局限于特定的主权国家,还应包括所有的人的社会关系乃至整个社会。这就意味着安全不能单一地从传统的战略意义上加以解释,即把安全的观念放在“以国家为中心的自身利益”之上。把重心从对主权国家的关心扩大到对人的关怀,它在理论上的一个含义是,对安全所指对象的确定不是一种中立的、客观的“描述现实世界”的事情,而是一种深刻的政治行为。

如何确保安全

如果安全概念本身以及安全研究和实践的所指对象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安全构成威胁的来源和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实现安全的手段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根据传统的安全政治理论,国家一直把外部(尤其是邻国的)军事力量看作是造成本国不安全的主要潜在威胁来源,而军事实力乃是实现本国安全的主要手段,即安全来自国家对自身权力的巩固、扩张和炫耀。同时,安全还来自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之

J. Ann Tickner, "Re-visioning Securit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 181; 亦参阅 Richard Wyn Jones, *Security, Strategy, and Critical Theory*.

参阅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Ken Booth, "War, security and strategy: towards a doctrine for stable peace", in Ken Booth (ed.), *New Thinking Abou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1, p. 349.

参阅 Ken Booth and Peter Vale,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Regional Insecurity: The Case of Southern Africa",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者对安全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可参阅 J. Ann Tickner, "Re-visioning Securit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J. Ann Tickner,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Cynthia Enloe, *Bananas, Babi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Pandora, 1989; Cynthia Enloe, *The Morning After: Sexual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Ken Booth and Peter Vale,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Regional Insecurity: The Case of Southern Africa",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p. 335.

间物质实力分配的不断调整和联盟政治关系等,或者说国家的物质状况如能力、技术成就、地理位置等被看作是造成安全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外交手段(譬如谈判、斡旋、仲裁等)和不同形式的机构合作也可以减少战争的危險,但安全的核心和必要条件乃是军事力量。

然而,随着世界政治的变化以及安全概念和安全所指对象的扩大,安全威胁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安全威胁来源的重新理解和寻找确保安全的新途径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关于安全威胁的来源,除了传统的威胁来源继续存在之外,我们还应具备以下两个基本认识。第一,安全威胁不仅来自外国军事力量,而且还包括其它因素。一方面,最终的威胁不一定是谋求侵占本国领土或推翻本国政治制度的邻国军事力量。更具威胁的潜在“敌人”往往是许多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军备竞赛、债务、人口过剩、污染、贫困、政治压迫等等。尽管许多国家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没有像冷战时期那样直接或具有灾难性,但是这些威胁不仅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是超国家层面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对付它们。另一方面,威胁还来自于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政治身份。国家不仅要抵御外来军事上的威胁,还要抵御外来的观念威胁、意识形态威胁。国家之间结盟既是军事上的,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观念和价值上的结盟。尽管领土主权问题仍然是引起国家之间冲突和战争的主要根源,但它不是唯一的根源。当代战争更多地是出于“捍卫”某种观念、原则、价值、政治认同等目的,譬如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索马里、海地、波黑、科索沃、以及阿富汗所采取的一系列暴力行动可以说明这一点。再譬如,北约东扩不仅是军事力量的东扩,还应该理解为是北约组织的价值、观念以及政治认同的东扩。

第二,安全威胁的来源可以由国家“想象出来”或通过话语等工具“建构”起来。也就是说,国家在确定威胁来源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利。安全政治涉及到确保自我政治身份的穩定,国家需要有一套叙述安全“威胁”的话语,这类话语不仅把某种“威胁”用文字固定下来,而且帮助国家确定“自身是谁、自身不是谁,以及自身的恐惧是什么”。如果国家说某

个东西是一种威胁来源,那么,它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威胁来源。然后,这个国家可以借保护“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名义,“合法地”动用国家资源,对内对外采取武力或强制行动。

由此,可以观察到,当今安全威胁来源的形成还与社会及文化内容相关。这说明,确保安全的途径不仅涉及到国家之间的物质关系,而且还涉及到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安全威胁是共同的,这就要求当今各国在空前的规模上进行安全合作。对于共同的威胁,各国需要展开共同的思考、使用共同的语言、制订共同的战略、采取共同的行动。共同安全,即在安全政治体系中,所有国家之间相互依赖,乃是实现当今安全的重要途径。

此外,国家之间需要彼此建立积极的社会互动关系,通过分享来自共同机构或机制的核心观念、知识和价值等,建构起旨在增加行为体彼此信任、学习和沟通、彼此行动更为透明化和可期待性的共同安全体,使冲突与不和在共同遵守的规范和机制中以外交方式加以解决。需要指出的是,暴力不会从国际政治中消失,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战争是一种社会建构,可以通过行为体之间的积极的社会互动而努力加以避免。

安全研究的性质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安全政治研究的目的以及这一研究如何能够对安全政治现实作出更好理解和说明的方法论。在“如何研究安全”方面,传统的安全政治理论谋求实现两个目标:科学目标和政治目标。所谓科学目标,是指安全研究通过吸收和采取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方法”,发展出可检验的理论假设,并从这些假设中总结出一般性的法则和理论,进而利用这些法则和理论去说明和预测安全政治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研究者应该谋求成为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 52. 关于“安全威胁”建构的论述,可参阅 Bradley Klein, “How the West Was Won: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of NA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4, No. 3, 1990; Simon Dalby, *Creating the Second Cold War: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New York: Guilford and Pinter, 1990; Iver Neumann and Jennifer Welsh, “The Other in European Self-identific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3, 1991.

参阅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le Wae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安全政治研究中的“物理学家”。所谓政治目标,即指安全政治研究的目的应该为国家安全政策服务。

应该承认,安全政治现实通过人的大脑活动是可以得到认识 and 理解的。但是,这个安全政治世界需要从它的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去加以理解和认识。安全政治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也就是讲,它不仅涉及到国家之间的物质关系,还涉及到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构成性的。国家之间物质实力的含义、对威胁来源的判断、结盟政治、战略威慑等均受制于国家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

因此,对安全政治的理解和认识需要分别利用实证和诠释的方法去获得。就方法论而言,安全政治的实证研究和诠释研究同样重要。前者利用经验分析去解释安全政治中涉及因果关系的“为何”之类问题;后者则关注安全政治的过程、演变和发展,对探索安全政治是“如何”变化之类的问题作出说明。这种联姻研究手段对安全政治中的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给予同样关注。它不是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一种社会文化取向。从分析变量上讲,安全政治研究不仅需要继续考察权力、利益、联盟、实力分配、地缘等在安全政治中的作用,还应该考察文化、规范、观念、信仰、社会学习、知识分享、话语、文本等对安全政治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引导人们抓住问题的核心实质,并对安全政治现实作出更贴切更真实的解释和诠释。下面我们利用这种取向对安全困境和战略威慑作出重新理解。

所谓安全困境,是指行为体谋求通过增强物质实力的手段去加强自身安全的做法会造成负面作用。以国家行为体为例,一个国家增强自身物质实力不仅意味着其它国家的实力相对削弱,而且在其它国家看来,这个国家变得具有危险性或威胁性。传统的安全政治理论把这种安全困境理解为是世界政治中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是固有的现实。不仅如此,安全困境还被看作是国际体系物质结构中不可避免的权力较量 and 冲突来源之一。

在安全困境方面,传统的安全政治理论看到了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但是,这类社会互动被认为是在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中进行的。从战略上讲,这些行为体都是理性的,它们不断适应着处

于变化的物质结构。但是,这些战略行为体并不进行复杂的学习过程,也不谋求建构其它的政治关系。根据对社会互动的这种理解,传统的安全政治理论认为,物质环境决定着安全困境的理性逻辑。

的确,国家行为体在制订战略计划或安全政策时,总是处于一定的结构环境中。然而,这种结构环境既与物质或独立于主观信念的客体有关,还与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有关。在建构主义看来,社会互动是由可从事沟通活动的行为体所构成的。这些行为体还在主体间的社会规则结构中运作。如果说世界政治中既存在着基本的物质结构,又存在着由规范、规则、观念、认同等所构成的社会结构,那么,安全困境可以理解为是被建构起来的社会规则,而不是固定不变或内在稳定的物质现实。它意味着这样的可能性,即行为体可以改变构成安全困境冲突的规则。

这种国家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以它们之间分享着历史经历、知识标准、对适当行为的期待,以及存在着彼此信任等作为基础的。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建构。通过社会建构和重建社会规则的途径,国家行为体可以解决传统的安全困境难题。在物质结构中,国家的行为通过物质实力的分配而得到调节。在社会结构中,国家的行为通过遵循社会化的规范、规则和价值而具有实际含义;国家行为体通过社会沟通、社会学习和达成共识等途径去实现与其它国家在行动上的协调。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学习,或者含义、概念、规范等从一个国家行为体传播到另一个国家行为体,这些在建构国家行为体主体间彼此理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不同国家之间能够相互分享观念、知识、价值,并形成集体认同的时候,它们之间就可能在安全问题上采取协调的行为。在这里,人们对安全威胁问题作出必要的理解。安全政治所要面对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威胁问题。物质实力的确是一种威胁。然而,敌人(“其他者”)的身份有时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在国家建

Brian Frederking,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s: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of the INF Treaty*, Vermon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 2;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1978, p. 169.

Brian Frederking,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s: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of the INF Treaty*, p. 4.

构“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敌人和军事威胁的建构涉及到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社会建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认识是,物质实力的含义是在国家行为体间的社会关系中所确定的。如果说国家之间能够形成集体认同,分享共同的观念、知识、利益等,那么,一个国家物质实力的增强并不会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在安全政治方面,它有助于国家行为体之间就彼此的安全或战略意图进行沟通,以和平方式处理安全困境的难题。

战略威慑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安全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理论发明之一,并经历过几次大的研究浪潮。所谓威慑,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定义是:通过使用威胁促使敌对方采取符合威胁方想法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威慑与战争及和平问题密切相关。威慑既不同于“防务”概念,也不同于“胁迫”含义,而是指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一般状态,譬如,敌对国家之间通过维持自身的军事实力去调节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取直接攻击行动。

长期以来,理性威慑理论以现实主义作为指导,强调威慑过程中物质因素和逻辑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说威慑理论是伴随着核武器的发明和使用而产生的话,那么,这一理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核武器在物质方面的破坏力,并强调作为核威慑基础的核报复能力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国家避免使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是因为害怕对方采取报复行为,因此,国家的行为始终是建立在逻辑判断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威慑理论还应该将物质以外的因素引入威慑研究中。传统威慑理论的不足在于它没有考虑到战略选择中其它重要的诸决定因素,譬如心理因素和组织因素。此外,国家的决策过程并不是在传统的威慑理论所假设的单一模式中进行的,而是在面临各种组织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冲突的环境里进行的。也就是说,传统的威慑理论把复杂的世界政治和安全政策过于简约化了。事实上,威慑是一种社会建构。国家避免使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并非都是出于害怕对方进行核报复的考虑。在许多情况下,规范、文化、分享的知识等制约着国家不可以任意使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伦理道德方面的考虑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在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威慑的工具也扩大了。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其它军事能力不再是唯一的威慑工具,经济手段譬如经济制裁、资金冻结、货物禁运、投资中止等等也正在成为安全政治中越来越频繁使用的威慑手段。话语也日益成为威慑的重要工具。当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发出威慑言论时,它不仅发出了沟通信息,而且意味着在向对方采取行为。也就是说,威慑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威慑的行为。

结语

采取批评的取向对安全政治进行重新思考,遵循的是如下逻辑:首先,安全的概念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具有历史性的,其含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其次,在当今世界政治的环境下,安全政治的所指对象应该扩大,它不仅是国家行为体,还应该包括人(作为个人、公民或群体的人)。这便引出安全政治研究在第三个层面的思考——如何确保安全的问题。如果人也成为安全保障的主要对象,那么,安全威胁的来源不再局限于传统上对主权和国家领土构成威胁的外来军事力量,而应该包括更为广泛的全球性威胁譬如生态环境、毒品、疾病、贫困等,因为它们对人的生命构成更为直接和现实的威胁。安全威胁还来自与社会文化有关的因素,这些使得确保安全的途径需要更多地从世界政治的社会结构关系中去寻找。最后,安全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应该多视角多取向。由于安全政治世界涉及到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因此,一种可取的方法是将实证研究和诠释研究相结合,使诠释研究同样具有科学的性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取向。

(责任编辑:郭志红)

Emanuel Adler,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1997, p. 346.

Rhichard Price and Nina Tannenwald, "Norms and Deterrence: The Nuclear and Chemical Weapons Taboo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7 - 118.

参阅 John Lewis Gaddis, "The Origins of Self - Deterr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n - use of Nuclear Weapons, 1945 - 1958", in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04 - 146, 转引自 Rhichard Price and Nina Tannenwald, *Norms and Deterrence: The Nuclear and Chemical Weapons Taboos*, p. 121.